

新史学

上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杨念群 黄兴涛 毛丹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史学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场念群 黄兴涛 毛丹 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下

獻身甘作萬矢的
著論求為百世師
任公先生自勵詩
壬午八月
暢安王世襄恭錄

暢安王世襄恭錄



9 787300 047898 >

定价: 60.00元 (上、下册)

新史学

上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杨念群 黄兴涛 毛丹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史学

下

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杨愈群 黄兴涛 毛丹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0-04789-0/K·261

I.新…

II.①杨…②黄…③毛…

III.史学-文集

IV.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794 号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杨念群 黄兴涛 毛丹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5351(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6.25

字 数 1180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中国史界向喜以“纪念”为名聚会,或铭人或怀事。到某日(如诞辰、起事日等)必发起一会。届时必是人头攒动之际,杯酒盛饌之时,老友畅叙,众声鼎沸,颇觉热闹。可一旦成瘾,要脱此定式,似乎很难。这次我们构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之初,扛的仍是近世名人梁启超这杆大旗,给人的印象似乎大有落入“纪念”俗套之嫌,也许应了经济史家最近频繁使用的一个说法: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过密化”的陷阱。这样的误解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同样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曰“纪念日”到底纪念什么?二曰这种“纪念”是否与歌功颂德式的所谓“赞词茶话会”有别?毫无疑问,一般纪念会的模式,无论是针对事件还是个人,基本都以缅怀功绩为主,诠释意义为辅。这套模式固然有其特殊的政治乃至市场效应,但对于知识累积的推进程度而言,却常让人有谀词过剩、意义阙失的感叹,无论人物与事件均极易成为无聊茶话的谈资与符号。

有此顾虑,如何区别以往之“纪念”,便顿成吾辈焦心之事。我们发现,除某事件与人物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的焦点外,某篇文章、某部著作或某一焦点论述均有可能成为思想的风向标,甚至昔人已去之后,仍如幽灵般支配着思想界的动向。面对这种情况,后世的学者多因折服或迷恋于其思想的魅力,无论是对其思想的诠释还是在具体研究的实践中,均极易抱定理所当然的态度贯彻其方法,尽管这样做往往会部分失去其自主判断的能力。同时亦有一部分学者抱定锲而不舍的信念试图摆脱其控制,超越其支配,尽管其努力犹如堂吉诃德徒劳地与风车搏斗。当然,惹得如此众多学者为其“斯人憔悴”的魅力篇章在中国近代史上实不多见,梁启超的《新史学》应该算是其中一篇。

众所周知,《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世界史”叙述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其后出现了多少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如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各种实证主义史学派,其基本的认知出发点均未完全偏离《新史学》所铺设的“进化史观”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新史学》已远远不仅与梁启超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已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而“新史学”被打上引号后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新地标,所以这次会议的副标题:“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就不是仅仅以个人或事件为纪念主题,也不会把“纪念”仅仅搞成抬轿子、说好话式的茶话活动。我们认为,从《新史学》发表到现在已整整百年之际,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清理《新史学》及梁启超相关论述中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不仅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史

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发起这次“纪念”活动的另一个新鲜动机,可以说是对如下现象作出的一种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学科的学者纷纷介入历史学界,历史学变成了不同学科诠释各种现象的“殖民地”和最大的“公共领域”。这可能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些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法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发现,仅仅依赖于对现实材料的梳理和审视尚不足以说明一些现象出现的缘起状态,而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时段脉络之内才能较为全面地予以评估。比如中国现在的法律体系基本依赖于现代西方法系为指导,但却无法把大量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习惯性解决纠纷的办法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为大量的习惯法恰恰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行为实践,如果不在历史源起的层面赋予它们以合理的解释,进而在现实法律运作中给予其合理的位置,将会妨碍法学诠释与运作的自主性发展,于是法律的历史文化解释变成了法学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又如人类学本以田野参与观察为特征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转机制,可是在中国存在大量历史资料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一些人类学家也试图通过解读历史文本来验证现实田野工作的可靠性,于是历史人类学成为“历史”与“人类学”联姻的媒介性学科。

第二个原因更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中国现代史学从一诞生起就与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处于同步并行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越向前推移,中国史学自觉接纳其他学科渗透的步履频率就变得越来越快,以致于在当代史学所采取的各类“方法”中,我们已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史学方法”。比如主流史学界一直坚持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学式的解释框架,著名的“五阶段论”即是例子,因为马克思本人在西方社会被公认为是与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并列的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可是,面对各学科方法的频繁渗透,史学界大多数会议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专门化学科分类方法进行组织的,与其他学科几乎老死不相往来,每年各种史学会议上很难出现其他学科学者的身影。打破学科专门化藩篱的口号已喊了多年,但若具体实施确有难度。有鉴于此,这次会议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分布于九个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参与讨论,其目的就是想尝试在实质意义上推动中国历史学界在多学科交叉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进程。令人欣慰的是,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自始至终激烈却又不失理性地相互交锋辩论,场面热烈感人,构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多元对话单元和现场交流的氛围。这部论文集就是想把这次会议所呈现出的多声部状态尽量全面地反映出来。

评点集中文字,汇总各家观点,按惯例本应是主编之责。然此次会议乃集各学科精英为一堂,众声喧哗之际,留下如此多纷繁复杂的话题,本就已成为“跨科际实践”的样本,其内涵之丰富性不但非我们心力所能迅速把握,而且其个中“弦外之音”与累积效应,恐怕只有在未来的多学科不断碰撞和交锋中才会慢慢释放出来。但我们终究抵挡不住有话要说的诱惑,还是勉为其难地粗粗进行了一次“主题划分”,当然如此划分

仅仅是按问题汇总推介各篇文章。这样做更像是勾勒出一幅“导游图”，目的是方便读者在众说纷纭的话语乱阵中把握一条远未清晰的主线和脉络。文集设置了七个“主题句”归纳概括各文要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硬性归纳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集中各文所昭示的论题可能相互交叉重叠，相对同时可以符合不同的主题设计，这是难以兼顾的，所以只能有点强人所难地按照我们的主观理解加以归类。文集中各文虽均关注理论问题，但大多数文字是建立在具体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或由具体研究中引申出若干论说，并非纯粹的谈玄之作，所以归纳主题亦是从其具体研究的关注角度出发而置。只不过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撮其要旨，述其骨架，而不得不忍痛忽略其属于血肉体验的那部分描写。

文集第一部分讨论社会科学的人史限度与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问题，收入的五篇文章即从以下的具体关注中人手指向同一个主题。贺照田通过研究殷海光晚年的史学思想，透视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唯科学主义”思潮支配下的心理困惑，提出社会科学方法的无节制人史有可能妨碍历史研究中直观、感觉和想像的发挥。在人文和社会研究领域，常识和直观本来应该成为和专业知识和理论、立场、主义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维，但这一维在今天过分被弱化了，所以人们愈来愈倚赖知识、理论、立场和主义。孙歌的文章延续了她近年来对中日战争记忆和亚洲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按她的理解，中日战争诠释的复杂性并不在于国家层面政治冲突与“科学解释”的合理程度，而是在于如何在常识与感性的层面重构历史的关怀。孙歌通过分析日本学术界出现的有关“昭和史”书写方式的争论，深刻反思了日本史学界在皇国史观与唯物史观两种对立立场之外构建新历史书写方式的可能性。她不仅试图在知识和思想传统与各种论争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系，也试图揭示日本现代史书写基本问题与中国现代史书写基本问题的连结点。

王铭铭的文章独辟蹊径，他通过重访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结构人类学》，来思考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试图证明被众多历史学家所误解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其实蕴含着诱发历史学背叛其原有政治事件史的叙事逻辑，颠覆其线性进化观的种子，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享学术资源的道路应该是既能脱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华美衣裳所包装的所谓“野性思维”，又能带着其“冷逻辑”来思考“热历史”。这种人类学化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化的人类学志在“解放”“热历史”在它的“垃圾箱”中“关押的”本来可以解释这种历史发生过程的“被忽略的历史”。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盟，要莫基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互惠逻辑之上，走进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使我们能够进行“总体性赠予”的、“礼物”的平台。

陈平原则提出应注重对梁启超新史学的述学文体风格进行研究，其中所蕴涵的文学想像，沟通了诗界、文界与史界、小说界的革命关系。陈平原强调史学的“文学性”，直接与贺、孙的观点相呼应。杨念群的文章运用“理论旅行”的方法透视中国现代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发生交融互动的复杂场景。他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就

是如何选择融入世界体系方式的过程,也是无可避免地使传统学术自主性逐步削弱乃至趋于丧失的过程。因此需从反思“地方”和“空间”的范畴入手。因为普遍性知识超越于地方性知识的状况,大大削弱了我们对民众真实生活的认知程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寻求区别于“空间”的“地方”上的地方感。另外,黄克武在反思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一方面肯定科学方法,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不足,从而对社会科学入史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比如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科学史学、实证史学的反省,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批判,对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关注等等,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史学危机的性质,并思索未来应该走的路。

这一组文章中的文字最终都可归纳为同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学在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的包围和支配下如何恢复乃至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对历史诠释中直观、常识的强调当然是一种路子,但如何确立直观感性等所谓“没有观念的智慧”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协调仍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而且常识与感性如何重复检验同样难以确认。

第二组文章不同程度地涉及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关系问题。西方的历史认知方式作为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传入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态度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同时西方式的历史叙事也作为普遍性知识形态日益支配着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与此同时,基层社会中的知识体系却仍以残存的状态延续下来。如何厘清和把握这两种知识形态及其交互作用,可能关涉着中国史学未来叙事路径的选择,不容掉以轻心地对待。

这部分收入的四篇文章中,赵汀阳与汪晖的观点颇有些差异。赵汀阳认为:一种历史观或者历史知识的生产模式,不管是西方的历史知识还是中国的历史知识,从起源上说都不是按照普遍知识的要求和设想方式而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和生活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叙事;各种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至少面临如何通过关于他者的知识而形成对自身知识的重新创作,以及如何变地方性知识为普遍性知识这两个问题。西方知识往往自称是普遍的,但这种知识尚无法描述类似中国的地方性经验,所以西方知识也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中还没有出现能够把世界上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的普遍有效的历史解释模式,所以都属于地方性知识。

汪晖则通过分析亚洲概念的形成与欧洲世界扩张之间的联系,从一个侧面间接反驳了赵汀阳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过分地强调亚洲的独特性,在解释现代的发生时,势必会把亚洲的现代看成是欧洲历史扩展的结果,从而最终否定“亚洲”概念所具有的文化多元论的意义。拒绝使用欧洲史的概念是一种重新回到自己历史叙事传统之中的努力,但却很可能产生另一种历史本质主义,最终落入一种二元比较的框架之中。近代“亚洲”概念的形成具有暧昧性和矛盾性,如果需要修正“亚洲”观念的错误的话,我们还必须重新检讨“欧洲”观念。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的“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所谓全球化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赵丙祥的文章则从一个具体而又特殊的视角揭示某种被西方社会科学化了的概念如何在中国历史语境中重新加以界定的问题。中国史学虽有自己丰富的传统叙述方式,但在现代社会中,史学在一般概念的形成是否足以和社会科学各门类进行对话交流方面所表现出的现状甚难让人满意。他试图借重新思考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等人对“礼物”的诠释传统,来讨论开辟中国历史学核心概念体系的可能途径。

第三部分“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中所收入的几篇文章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中国历史书写的变迁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与诠释问题。中国素来有自己的历史书写传统,此传统与西方差异尤大,可是进入近代以来,这种传统书写逐渐与西方有趋同之势,从而难免忽略了对中国历史过程细节的把握和认识。葛兆光即认为历史书写中存在着“加”与“减”的相互作用过程,历史中不断涌现的现象是由加法予以昭示的,不断消失的内容则是减法作用的结果。过去的思想史往往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加法”运作,而有意“减去”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新思想史恰恰应该把被“减去”的内容重新放回历史中予以审视。

张研通过对社会史研究的关注,认为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让人能理解、能明白,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书法,应是我们追寻的更高目标。章清讨论的是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如何被纳入到一种普遍的叙事模式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论述的基本视野。毛丹则通过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分析文本,诠释了民主政治与“正义”之间关系的错位及“正义”本身的多义性。他的论域也可算是广义的历史书写问题。刘北成则想借助一个个案访谈揭示“世界史”的主流书写方式与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历史书写”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状况。

对“历史记忆”的研究一直为中国主流历史学所忽视,在主流史学中,对所谓客观历史与演进规律的把握及对群体运动史的长期偏好一直支配着人们的认知导向,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关注历史记忆的有意选择与政治意识形态构造的共生关系。在这组文章中,赵旭东与罗劲通过对河北白洋淀一位抗日英雄在乡村的被表述过程的分析,打破了原有史学模式认为乡村只存在一种国家记忆图式的观点,认为在跟国家历史表述中的历史真实相一致的英雄图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对此图式构成挑战的对英雄叙事的怀疑。这种发现对史学界如何挣脱主流史学中僵化的历史书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四部分的文章涉及的均是“文化史”研究的主题,20世纪兴起的“文化热”,其中西观念比较的思维导向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支配性影响。进入90年代,如何有效地摆脱80年代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二元对立模式的限制而走出一条新路,一直是中国史学是否能有所突破的关键。这组文章可视为这方面的初步努力。黄兴涛把近代思想文化史看作是以新名词为网结而编织起来的文化之网,新的思想观念就其社会化过程而言,更多的不是或不单是通过单纯的思想文本和体系形成,而是往往通过

大量新名词的传播逐渐形成,新名词往往成为精英和大众文化的中介。“新名词”与文化史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定位:一是近代以来新名词与文化内部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一是新名词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应注意新名词在不同语际中的使用问题。纳日碧力戈则从分析中国近代种族观念的演进入手,视“跨语言实践”为一种更加复杂的历史演出。如可以把中国“种族”观念演进划分为“文化—想像式”和“政治—命名式”等两个阶段以及“文字—核心式”和“口传—边缘式”等两个层面。两个阶段分别描述古代中国以文化为轴心,以天下为理路,想像“种族”地理和“种族”形貌的特点,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以“华夷战事”为主线,以政治命名为手段,表现强烈的排外情绪的种族话语特征。两个层面是指掌握文字资本,代表国体文化主流且控制或影响舆论取向的近代士绅和现代精英,利用知识、信息、媒介、声誉、地位和影响等优势,对“种族”概念进行解释、变通和定义的现象,以及民间“种族”知识和介于官方和民间的“边缘化”种族观的表述。纳日的目的是想打破单纯从“语言翻译”入手诠释文化思想变动的趋向,认为翻译活动是立体的“搅拌”工作,不限于文房四宝与辞典定义,既有历史的制约,也有政治的掌控,还有临场决策,甚至刺激感官的视觉和听觉以及支配身体的技艺等发挥的社会功能都非人工语言的传输所能概括。“文化史”的探索边界由此被扩大了。

李天纲的文章则是想重新诠释“西学”与“汉学”的关系,纠正清初“汉学”缺少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而只具“知识形态”外壳的偏见。他力图证明清初“天道观”的建立始于考据,终于通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本体论、世界观、方法论和伦理学说。其中仍具“究天人之际”之风格的思想显然受“西学”的启示和导引,清儒精神也由此与近代精神接脉相通。李天纲的治学风格属于在旧学脉络里的跨语际分析。

记得秦晖几年前就撰文批判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决定论”式的思想史研究,因此他的论文自然也秉承原来的运思路径,不会单单从“文化”着手涉入问题。收入本书的论文即杂糅了思想史与制度史的分析方法,反思中国社会结构演化的成败得失。他区分“典籍文化”与“社会文化”,认为精英知识分子虽表面上控制和传播典籍中的形而上层面,真正有效的仍是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社会思想”,这样一来,广义上的制度运作与安排等也转化成了“文化史”的关注课题。例如“儒表法里”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表述,而且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行为实践。

王笛为了探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成都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样态,引入了“街头文化”这样一个分析概念,试图回答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怎样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的交互影响等问题。王笛对“街头文化”的诠释显然受到“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研究范式的影响,但他试图更加从动态的行为而非西方话语所界定的“空间”意义上来理解城市生活的变迁,特别注意通过梳理史料中所蕴涵的生活场景,并予以细致描写,呈现人民的生活常态。这种“动感”十足的

工笔画式的描绘其实需要良好的感觉和想像,并非盲目追求史料堆砌的所谓纯实证研究所能轻易达致。

第五部分收入的数篇文章讨论的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区域社会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甚至有人说21世纪是社会史时代的来临,在这个领域中西方社会科学的冲击渗透也最具效果。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应用直接支配着社会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基本叙事风格的转换,所以最具前沿性也最具争议性。这组文章可以说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话碰撞的一份记录。刘志伟文章的副题是“关于族群与地方社会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他运用人类学有关族群认同的分析路径,突破传统“移民史”所构建的中原汉族文化如何向南方渗透,以教化“蛮夷”的“神话”叙事,提出另一个中华帝国形成的视角。这个视角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帝国权威的隐喻向南方边疆的渗透,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布法令去实行的,通过追溯汉化移民向周边扩散的历史,不足以解释地方社会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以及划分族群的界限如何形成。对于本地许多人来说,他们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取而代之的方法是,我们应该集中分析本地人如何运用文化策略把自己与真实的或想像的“中心”联系起来,经过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他们最终取得一个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的标记,并且各就各位地去确认自己的身份。

陈春声和陈树良的文章通过对东风乡陈氏宗族的整合过程和与此相关的若干民间信仰故事的分析,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了质疑,文中认为乡村故事对于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故事蕴含了有关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乡村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以及乡民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对这些故事和传说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研究者可更加深刻地重构乡村的历史。这种解析和理解,不但有赖于研究者的睿智和聪敏,更重要的是要细心地把文献的解读与对实地调查所得的理解真正结合起来。乡村社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

李伯重的方法论意识则体现在设问西方理论的引进是否与中国的历史研究节奏相合拍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对史学的支配力有渐强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史学(特别是经济史)的理论往往惟19世纪社会理论马首是瞻。要改变此状,就需不断采纳和适应当代社会理论的诠释框架。这里不是一个如何限制社会理论入史的问题,而是不断根据中国史学现状,替换其理论基础的问题。

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一直未获充分认可,实际上在主流史学内部,口述史的史料征集采写,也一直为“文本传统”所压抑而处于边缘位置。这本身并不奇怪,但不可否认的是,史学内部的口述史研究无论在资料收集还是在叙事方法上均未形成对“文本解读传统”的突破也是导致其在史界隐而不彰的尴尬局面的主导原因。与史界的这种局面构成反差的是,目前社会学界的一批学者自觉走向田野,积累个人化的口

述题材,经过多年努力,已至少在局部构成了对主流文本叙事的质疑和挑战。

郭于华、孙立平的文章即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计划系列工作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个计划的前期成果如方慧容关于“无事件境”研究的发表已逐渐引起中国社会史界的重视。这篇文章试图超越仅仅站在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叙事的角度理解农民现代政治观念形成的思路,而是通过对“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的分析,透视其如何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提炼,从而使其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与国家意识形态如阶级分析建立起联系的。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不仅成为日后与之相伴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而且是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塑造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基础。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成为中国思想界议论的主题,但在国内似乎一直没有真正转化为中国历史研究的资源。而这组中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直接间接地涉及了这一理论在中国史界的应用前景。马敏的文章直接把近代以来中国商会史研究概括成:政治史、现代化与“市民社会”三种研究范式并一一点评其得失。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城市史”研究曾持续受人关注,而且一直是“公共领域”理论应用的“实验场”。另外,行龙的论文也通过对施坚雅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区域系统理论的反思,涉及了城市变迁与现代化模式的关系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受到“文化热”的影响,一些法学研究者开始介入史学领域,试图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梁治平当年运用中西观念比较的框架,以西方法律观念的演进为参照系,全景式地探讨了中国“法律”与相关文化领域的关系,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

第六组文章均由具有法学训练背景的学者所撰写。梁治平的文章主要回顾了现代的中国法律史自梁启超开始建立以来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力图从知识旨趣、研究方法、叙述模式和学术范式等方面入手,厘清这一现代知识体系中特定部门在不同时代、地域和人群中发展的脉络。朱苏力在重新解读梁祝故事后不但重构了古代人对这一文本的可能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并理解了已经远去了的人们的情感方式,并由此提出了一个貌似“怪异”的观点,即制度的合理性不是永恒的,制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而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早婚状态下,“包办婚姻”有其制度上的合理性,而正是因为梁祝悲剧的发生,才使人们认识到传统婚姻制度的弱点,才萌发了进行更多选择的意愿和可能性。朱苏力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争议,但其独特的法律史视角仍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张世明兼有历史学和法学的训练,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从发生学、语用学和法理学等三个角度相当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宗藩关系结构,明确提出了既区别于法学史也区别于传统清史研究的新历史法学的分析路向。

“后现代”作为一种流行思潮被引进中国已有数年,各种理论的推介颇有让人眼花

缭乱之感。但中国历史学界基本上对之采取拒斥态度,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现代化的方案尚未完成,似乎与“后现代”话语难以攀上瓜葛,也没必要与之对话。其实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由于不是如西方那样的内发性的演进态势,其内部早已包含了诸多“后现代”的因素,只不过这些因素的表现形态与西方社会有异而已。对此类因素视而不见,只能导致中国史学诠释方法继续向单调的方向发展。

第七部分收录了两类讨论“后现代”思潮的文章。一类文章专门讨论“后现代”方法在中国的理论表述问题,另一类文章则比较具体地涉及“后现代”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实践。

在赵世瑜的文章中,传说与历史及历史记忆之间的边界被重新设定。在他的眼里,了解历史文本与传说之间的共性似乎比确认它们之间的区别显得更为重要。传说与历史的共性不仅在于它们都是在某种叙事逻辑和结构支配下的产物,而且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历史记忆。只不过“历史”经过精英的加工变成了符合其旨趣的文本,而“传说”则是在底层以某种不规则的口述形式流传而已。因此有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认知区别,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中,传说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就是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差别;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虚构与事实之间是否有边界可能就是一种“虚构”。孙江的论文则分时段地回顾了西方“新史学”向“新新史学”转变的历程,并分析了近代中国史家在批判传统从而接受了西方现代史学的洗礼之后,又跌入民族—国家话语圈套的尴尬境遇,指出中国新史学不能走“复古”的老路,即盲目接受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结构整体史的过时思想,而应该从容面对后现代方法的挑战,走出自己的新路。程美宝的论文同样涉及了后现代史学叙事的问题,比如文中提到,梁启超当年提倡书写“群体历史”,表面上可以和“大众的历史”划上等号,实际上“群体”仍被纳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中,成了某种国民意义上的历史,与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历史无关。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寻找和叙述由“地方性知识”和民众经验滋养培育的底层历史。

这部分中有两篇文章较多涉及了运用后现代方法具体研究历史的尝试。“身体史”研究在国外史界已成气候,在国内尚不多见。应星的论文主要关注身体在现代政治中的处境和与现代性问题的关联。因为身体在东西方古代都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进入现代社会后才发展出了身体政治,但身体政治在东西方中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现代西方,身体成为政治主题的过程与灵魂统治身体的观念从政治中消失是同一个过程。而在现代中国,身体成为政治问题与身体的国家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现代性的构成是外力压迫的结果,富国强兵一直是清末以来压倒一切的目标,所以身体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富国的工具;而在阶级斗争成为现代性政治主题后,人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发生分离,身体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被政党伦理和阶级伦理所赋予的。余新忠的文章则主要回顾了作为史学界“另类”风格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在中国的新进展以及尚面临的诸多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解决困境的思路。

以上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份“导游图”。它可能会显得过于笼统粗糙,但有兴趣的读

者至少可以按图索骥地进入会议论域的核心地带。为了保留当时多学科对话众声喧哗的氛围,让读者更直接地去体味多声部讨论的魅力,我们又特意把与会学者的现场发言、大家的评论及报告人的回答录下音来,并请人整理成文字,附在文章的后面,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对照参看。

我们深知,无论是组织一次学术会议还是编订一部论文集,都需要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首先要感谢与会各位学者的认真参与。在同一学科中汇集众多的优秀学者参加一场会议已属难得,而要邀请如此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赴会以形成多元对话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对此心怀感激之情。我们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教授的支持;感谢中商嘉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明先生对论文集出版的慷慨资助;感谢在会议筹备与录音整理等工作上付出辛勤劳动的同事和学生王江、牛贯杰、齐瑜、刘焕性、孙哲、毛力平、邓文峰等。正是因为大家投入如此高的热情参与其中,才共同构成了这次讨论会浓浓的愉悦氛围。

杨念群 黄兴涛 毛 丹

2002年11月14日

章 涛	“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	236
毛 丹	历史文本中的正义面相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种政治思想史读法	265
赵旭东	罗劲 图式冲突中的英雄观念重构与真实性告诫 ——以华北一村落有关抗日英雄的集体记忆为例	278
张 研	今思新史学	297
刘北成	“热月政变”学案	310

四.文化史的新探索

黄兴涛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 ——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	323
秦 晖	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 ——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	342
纳日碧力戈	“西学东渐”和“跨语言实践” ——以“种族”、“民族”等说事	389
李天纲	清代儒学与“西学”	400
王 笛	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公共生活研究的现状、资料 and 理论方法问题 ——以成都为例	419

五.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自觉与反思

刘志伟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 ——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445
李伯重	史学与变化 ——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	459
陈春声	陈树良 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 ——以东风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 ...	471